

# 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李周强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运用全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库的 957 个样本, 实证研究乡村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 结果表明: 72.2% 的受访者对村中大部分人表示信任, 对村中大部分人越是信任, 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热情越高; 村民对自己家人、亲戚和好朋友的特殊信任比率明显高于对陌生人、生意伙伴、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 而普遍信任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产生显著积极影响, 特殊信任不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 民族、年龄、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年收入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也产生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 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信任; 特殊信任; 普遍信任; 基层选举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6)06-0064-06

##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election of villagers' committe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ocial trust

LI Zhouqi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Using 957 samples of the national rural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survey database,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of rural social trust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shows that: 72.2% of the respondents expressed trust in most of the village people; the more the villagers trust their common village people, the higher voting enthusiasm they show in participation in the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 the rate of villagers' trust with their families, relatives and good friend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strangers, business partners, the community, universal trus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villagers' participate in the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while particular trus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In addition, ethnic, age, political status as well as the annual income of the villager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Keywor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ural social trust; particular trust; universal trust; grassroots elections

###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1万个,其中村委会58.1万个,所占比重高达85%<sup>[1]</sup>,村委会在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位置。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社区,其管理者是通过村民直接选举产生<sup>[2]</sup>,村民选举已对中国农村政治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sup>[3]</sup>,村民对村委会的选举

也倾注了很大热情<sup>[4]</sup>。村民的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村民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参与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

针对基层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学界近年来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人口统计学因素。如性别、政治面貌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有学者通过定量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积极参与到选举中<sup>[5]</sup>;党员居民的投票可能性高于非党员居民<sup>[6]</sup>;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政治参与热情越高<sup>[7]</sup>等。二是社会资本因素,如信任、网络和互惠等。社会网络培育强大的互惠规范,

收稿日期: 2016-10-10

作者简介: 李周强(1993—),男,壮族,广西宁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民主与治理。

参与者之间的交往越多,合作的可能性越大<sup>[8]</sup>。就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因素而言,学界主要侧重于研究政治信任对不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Gamson 研究发现,政治不信任会直接影响“非制度化”的、成本较高的政治参与行为发生,如直接参与抗议政府行为<sup>[9]</sup>。Shingles 认为政治信任会带来较低成本的政治参与行为,如参加选举<sup>[10]</sup>。Southwell P L, Pattie C 和 Johnston R 发现较高的政治信任会导致较高的选举参与率<sup>[11-12]</sup>。郑建君、孙昕等结合中国基层民主的特点,得出公民政治信任同基层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关系的结论<sup>[13-14]</sup>。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学界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并且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政治信任与不同政治参与的关系,但有关乡村社会信任影响村民参与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sup>[15]</sup>。与政治信任侧重于体现政府行为跟公共利益契合度、合法性及支持度<sup>[16]</sup>不同,社会信任强调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出发,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人或群体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语承诺的信任<sup>[17]</sup>。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度越高,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与合作越容易实现,社会治理水平越高<sup>[18]</sup>。按照信任的对象有无血缘关系、是否具有亲密的交往和关系,社会信任又可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有人认为特殊信任高于普遍信任<sup>[19]</sup>;也有人认为普遍信任比特殊信任更重要,因为较高的普遍信任反映较高的社会平等程度<sup>[20]</sup>,同时与公民社团、政治参与之间的逻辑关系呈现一种复杂的状态<sup>[21]</sup>。笔者拟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出发,基于全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库,探究村民对村中大部分人的社会信任状况;在对村民社会信任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厘清村民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具体状况;检视乡村社会信任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产生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马得勇、王正绪主持的“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2008—2011)”数据库。该

项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包括北京、天津、浙江、四川、甘肃等在内的 10 个省或直辖市中的 24 个乡镇,对其下辖村庄展开包括问卷和访谈在内的调查。调查采用非概率抽样的方法,每个乡镇选取 2~3 个行政村,对每个村的住户进行全面调查(每户只调查一人),共收集有效问卷 2 613 份。考虑到本研究目的,此次数据仅选用问卷中关于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征、社会信任状况和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等内容的统计数据。为更具针对性,同时更加精准地反映乡村的社会信任状况及其同村民基层政治参与的关系,对样本中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剔除相关变量缺失值及“不知道”、“不想说”等无效值,得到的最终样本总量为 957 个。

### 2. 变量选取

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影响政治决策、维护群体以及个人利益、实现政治监督和权力制衡的途径,在学术上有着多种理解。同传统意义上将政治参与仅仅界定为选举等行为不同,当代西方政治学认为,任何有意影响公共事务或决策的政治行动,均被视作政治参与<sup>[22-23]</sup>。因此,在当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框架下,政治参与既包括如投票、参与选举、助选等传统政治参与,也包括非传统政治参与,如公开向媒体表达意见、向政府官员投诉(上访或请愿)乃至抵制、示威、游行占领等类型的政治行为<sup>[18]</sup>。考虑到样本调查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研究因变量理解为传统的政治参与,指的是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这一具体政治行为,并且选用问卷题项“您参加最近的村委会主任(就是村长)选举的投票了吗?”对村民进行调查,被访者在“参加了、没有参加”这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社会信任是预测变量,以信任对象有无地域限制分别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测量。微观层面,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觉得您所在村里的人大部分可以信任吗?”以考究村庄的社会信任状况。宏观层面,考虑到村民的信任对象并不一定是本村人,故对信任对象的测量不进行地域限制,通过询问受访者对自己家人、亲戚、好朋友、陌生人、生意伙伴或合伙人、社会上大多数人等 6 类信任对象的信任程度来测量村民的社会信任状况。信任程度分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四类,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调查结果来看,微观层

面上,村民对于村中大部分人是信任的,信任百分比达72.2%;宏观层面上,受访者对于自己家人、亲戚和好朋友的特殊信任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对

象,对生意伙伴/合伙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与不信任百分比基本持平,而对陌生人的信任百分比是6类信任对象中最低的。

表1 乡村社会信任状况频数统计表

	不信任					信任				
	完全不信任		不太信任		总百分比/%	比较信任		非常信任		总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村里的大部分人	266				27.8	691				72.2
自己的家人	4	0.5	10	1.0	1.5	204	21.3	739	77.2	98.5
亲戚	3	0.3	27	2.8	3.1	393	41.1	534	55.8	96.9
好朋友	7	0.7	60	6.3	7.0	446	46.6	444	46.4	93.0
陌生人	373	39.0	472	49.3	88.3	99	10.3	13	1.4	11.7
生意伙伴/合伙人	76	7.9	335	35.0	42.9	463	48.4	83	8.7	57.1
社会上大多数人	101	10.6	366	38.2	48.8	445	46.5	45	4.7	51.2

控制变量采用具有人口统计特征的变量,诸如性别、民族、年龄段、政治面貌、家庭年收入等。通过进行编码赋值后在运算过程中对上述变量进

行控制。因变量、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及赋值如表2。

表2 变量描述及赋值表

变量	赋值
因变量	
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与否	0=没参加, 1=参加了
预测变量	
对村中大部分人信任	1=不可信任, 2=可以信任
特殊信任	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自己的家人	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亲戚	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好朋友	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普遍信任	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陌生人	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生意伙伴/合伙人	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社会上大多数人	1=完全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比较信任, 4=非常信任
控制变量	
性别	1=男, 2=女
民族	1=汉族, 2=少数民族
年龄段	1=18~29岁, 2=30~39岁, 3=40~49岁, 4=50~59岁, 5=60岁及以上
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 2=非党员
家庭全年收入/元	1=1000以下, 2=1000~2000, 3=2000~4000, 4=4000~6000, 5=6000~1万, 6=1万~2万, 7=2万~3万, 8=3万~4万, 9=4~6万, 10=6~10万, 11=10万及以上

### 三、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在探讨乡村社会信任对村民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之前,先运用spss20.0对各预测变量之间、各控制变量之间及其两类变量之间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预测变量之间、控制变量之间及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高或不存在相关性。因此各预测变量和各控制变量

可以排除共线性干扰。由于受访者是否参与村委会主任投票这一因变量属二分变量,故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运用主成分法对6类不同信任对象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种类型进行因子分析。普遍信任因子包括对陌生人、生意伙伴/合伙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特殊信任因子包括对自己家人、

亲戚和朋友的信任。按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分别赋值 1~4 分，分值越高则表示信任度越高。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发现  $KMO=0.694$ ，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1251.838$ ，表明各变量具有相关性；以特征值大于 1 作为选取标准，解释方差  $=63.425\%$ ，因子分析有效(表 3)。6 类信任度均值分别为 3.75、3.52、3.39、1.74、2.58 和 2.45，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

表 3 乡村社会信任的因子分析表

	普遍信任因子	特殊信任因子	共量	均值
自己的家人	-0.095	0.401	0.656	3.75
亲戚	-0.066	0.422	0.758	3.52
好朋友	0.030	0.371	0.679	3.39
陌生人	0.472	-0.138	0.554	1.74
生意伙伴/合伙人	0.441	-0.002	0.584	2.58
社会上大多数人	0.438	0.003	0.575	2.45
特征值	2.372	1.434	3.806	
解释方差(%)	39.533	23.893	63.425	

注： $KMO=0.694$  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1251.838$  ( $P<0.001$ )

的信任度均值分别为 2.26 和 3.56。通过比较普遍信

任和特殊信任的信任度均值可以发现：虽然村民对普遍信任对象并没有表现出完全不信任，但是对自己家人、亲戚、好朋友的特殊信任明显高于对陌生人、生意伙伴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这也与李伟民、梁玉成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sup>[19]</sup>。

其次，通过建立模型实证研究乡村社会信任对村民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模型 1 以受访者对村中大部分人的信任状况作为预测变量，以具有人口统计特征的变量为控制变量，以受访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作为因变量，分析村民对村中大部分人的信任与其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关系。再根据对预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以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个因子作为预测变量，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 2，分析宏观层面的社会信任对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模型 3 是模型 2 的优化。另外，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模型 1 中能通过  $P=0.05$  水平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不能通过  $P=0.05$  水平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在模型 3 中予以剔除，各回归模型运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影响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S.E)	Exp(B)	B(S.E)	Exp(B)	B(S.E)	Exp(B)
预测变量						
村中大部分人	0.501(0.147)* *	1.573				
特殊信任			0.173(0.144)	0.841	0.106(0.156)	0.900
普遍信任			0.316(0.126)*	0.729	0.217(0.136)*	0.805
控制变量						
性别	0.093(0.145)	1.098				
民族	-0.378(0.145)*	0.685			-0.400(0.147)* *	0.670
年龄段	-0.633(0.065)* * *	0.531			-0.627(0.065)* * *	0.534
政治面貌	-0.523(0.249)*	1.687			-0.532(0.248)*	1.703
家庭全年收入	-0.125(0.037)* * *	0.883			-0.121(0.038)* * *	0.886
常量	-1.160(0.649)* * *	3.189	0.881(0.529)* * *	2.414	2.122(0.832)* * *	8.349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01$ ，\*\*\*表示  $P=0.0001$ 。

分析结果显示：村民对村中大部分人的社会信任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  $P=0.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R$  方大于 0.25(Cox&Snell  $R$  方  $=0.28$ ，Nagelkerke  $R$  方  $=0.32$ ， $B=0.501$ ， $P=0.001$ )，模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这表明村民对村中大部分人的信任度与村民参加村委会主任选举投票呈显著正相关，即村民对村中大部分人越信任，就越会积极参与到村委会选举投票中来。另外，在增加了性别、

民族、年龄段等控制变量后，除性别这一控制变量外，其余控制变量均具有显著相关性。民族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  $P=0.05$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B=-0.378$ ， $P=0.009$ )，说明相较于少数民族村民，汉族村民参与村民选举活动的积极性更高。年龄段系数为负，通过了  $P=0.0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B=-0.633$ ， $P=0.0001$ )，表明年轻人比年长者更积极参与村中选举投票，与已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sup>[24]</sup>。

政治面貌系数为负,通过了 $P=0.05$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B=-0.523, P=0.036$ ),乡村党员参与投票的可能性高于非党员村民,这与城镇居民情况相同<sup>[6]</sup>。最后,家庭年收入水平系数为负数,通过了 $P=0.0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B=-0.125, P=0.0001$ ),乡村内的贫困家庭较之于富裕家庭更愿意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希望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选出能代表自己的人,从而改善家庭的贫困窘境,越是贫困的家庭越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行为来改善家庭境况<sup>[18]</sup>。

另外,在模型2宏观层面上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村民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之间的关系研究中,特殊信任不能通过 $P=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普遍信任能通过 $P=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Cox&Snell  $R^2=0.26$ , Nagelkerke  $R^2=0.30, B=0.136, P=0.012$ ), $R^2$ 大于0.25,模型拟合效果较为理想;普遍信任系数为正,说明村民的普遍信任越高,对村委会选举投票越能产生积极作用。这种关系的存在,可以用已有学者的研究结论解释,即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越高,越能反映较高的社会公平<sup>[20]</sup>,促进人与人之间互惠与合作的实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sup>[18]</sup>。模型3在剔除模型1中无法通过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后,村民宏观层面上的特殊信任系数仍然不能通过 $P=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普遍信任及控制变量依然能通过 $P=0.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Cox&Snell  $R^2=0.26$ , Nagelkerke  $R^2=0.29$ )。模型2和模型3中的特殊信任都未能通过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检验,使得研究特殊信任对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无法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最终导致笔者不能对村民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与其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宏观层面上未能得出特殊信任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导致出现最后的预期差距,原因大致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受到问卷测量方面的影响,对村民各类信任对象的信任度测量并非采用标准量表从而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存在样本选择的误差,数据库的样本选取采用非概率抽样,并不是随机抽样,也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2008—2011年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957个样本的调查数据,以乡村社会信任为视角,实证了乡村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资本因素等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具有重要影响<sup>[25-26]</sup>,本研究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有超过70%的受访村民认为村中大多数人是可信任的,因为乡村的地域范围不大,每家每户的社会交往形式受到地域限制,村民对乡村的基本状况都能掌握,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对村中大部分人信任也是情理之中。对村中大部分人越信任,在村委会选举投票中表现就越积极;村民普遍信任的信任度越高,在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中越能产生正面影响;民族、年龄段、政治面貌和家庭年收入也是影响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重要因素。同时发现,村民对自己家人、亲戚和好朋友特殊信任的占比分别为98.5%,96.9%和93%。对陌生人、生意伙伴/合伙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占比分别为11.7%,57.1%和51.2%。乡村的特殊信任明显高于普遍信任。村民对生意伙伴/合伙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度均值分别为2.58和2.45,说明村民并未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普遍信任持完全不信任态度。

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是发展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为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发展基层民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提高村民对村中大部分人的信任和村民对社会的普遍信任。一是健全和完善地方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平环境,为乡村村民的社会交往与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在乡村中普及电视、电话、手机和网络等现代通信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推动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吸引村民对乡村事务的关注,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从而提高村民的参与水平。三是在村中举办一些文娱活动,注重利用乡村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像游花灯、庙会及重大节日仪式,增加村民之间交往的频次,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村民之间的认同感。同时,考虑到民族、年龄段、政治面貌和家庭年收入水平这些因素也会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产生影响,政府还要对少数民族村民和年长者进行引导,党员对非党员村民加强思想指导,提高

其积极参与意识,在参与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对收入水平低的家庭,村民要多加关心,村委会要对贫困家庭提出的诉求予以关注,为其脱贫提供帮助。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和缺陷:一是采用的是二手数据,在对变量进行量化时会受到数据库题目的限制,如数据库中对信任度的测量并不是标准的量表,在测量精准的信任度时会带来困难;二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契合研究目的,对缺失或存在无效值的样本予以剔除,导致实际样本量小于原样本量,对最终研究结果和分析产生不良影响,如因子分析的因子累积解释方差不足 65%,但 KMO 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可能与样本剔除存在一定关系;三是影响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因素复杂,用社会信任这一个预测变量并不能解释全部现象。

#### 参考文献:

- [1] 民政部. 2015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R]. 民政部门户网站 2016-07-11,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607/20160700001136.shtml>.
- [2] 胡荣. 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M]. 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01: 8-16.
- [3] Zhang X, Fan S, Zhang L, et al.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8(12): 2857-2871.
- [4] Wang X. 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peasantry: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1997, 25(9): 1431-1442.
- [5] 胡荣, 沈珊. 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和公众的政治效能感[J]. 东南学术, 2015(3): 23-33.
- [6] 李向健, 孙其昂, 孙旭友. 地位、政治关注、政府信任与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投票参与——一项来自 CGSS2010 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J].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43(4): 31-36.
- [7] 乐章, 涂丽. 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与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基于十省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 2015, 29(2): 23-28.
- [8] 裴志军, 杨峻. 社会资本、中间投票人和村民选举中的贿选——基于浙西 37 个行政村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11): 19-27.
- [9] Gamson W A. Power and discontent[J]. Dorsey Press, 1968(3): 435.
- [10] Shingles R D. Black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missing link[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1, 75(1): 76-81.
- [11] Southwell P L. Alienation and nonvo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fined operationalization[J].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85, 38(4): 663-674.
- [12] Pattie C, Johnston R. Losing the voters' trust: evaluation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voting at the 1997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1, 3(2): 191-222.
- [13] 郑建君. 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 625 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3(6): 61-74.
- [14] 孙昕, 徐志刚, 陶然, 等. 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7(4): 165-187.
- [15] 胡荣, 胡康, 温莹莹.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 社会学研究, 2011(1): 96-117.
- [16] 钟杨, 王奎明. 关于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多维度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5(6): 87-97.
- [17] Rotter J B.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 35(4): 651-65.
- [18] 王思琦. 政治信任、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J]. 公共行政评论, 2013, 6(2): 22-51.
- [19] 李伟民, 梁玉成.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 社会学研究, 2002(3): 11-12.
- [20] Uslaner E M.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2, (1): 647-648.
- [21] Paxton P.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nd Generalized Trust: A Multilevel Model Across 31 Countries[J]. Social Forces, 2007, 86(1): 47-76.
- [22] Almond G A, Verba S.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98-99.
- [23] Verba S, Nie N H, Kim J O. The mode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M]. Sage Publications, 1971: 111-121.
- [24] Zhong Y, Chen J. To vote or not to vote: An analysis of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village elections[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2, 35(6): 686-712.
- [25] 傅熠华.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农民政治参与进行分析预测——基于全国 272 个村庄 3993 份问卷的调查[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2): 54-59.
- [26] 裴志军. 制度刚性下的村民自治参与: 社会资本与政治效能感的作用[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5): 33-43.

责任编辑: 曾凡盛